专栏导语：利用实验方法理解公共治理之道

孟天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伟大的治理实验，为后发国家的治理现代化之路积累了丰厚的知识体系。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在过去40年中不仅创造了迷人的经济奇迹，更为后发国家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与公共治理之路，实验思维、实验路径无疑是中国治理转型的实践方法论。改革伊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开启了以改革成效来评价制度优劣、政策效果和改革成败的兼具渐进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改革方法论（吴敬琏，1994；Heilmann，2009）。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中国先后经历了产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基层民主改革、单位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制度变革，实施了一系列诸如开放特区、新区（开发区、示范区）、新医保、新型城镇化、卫生文明城市、智慧城市等政策实验，从而为我们探究公共治理之道创造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治理创新最活跃的“社会试验田”。

在治理转型的大语境下，中国的诸多制度变革、政策实验正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深度关切，更为中国学术界基于本土经验生产出一般性社会科学知识提出了更高要求。毫无疑问，实验方法作为社会科学新兴研究方法，契合改革期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方法论，正在大力推动依托中国实验形成若干公共治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促使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实验思维古已有之，文艺复兴时代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首次阐述了实验科学的方法论，认为实验是可复制地观察科学规律的方法（Durant，2012）。此后数个世纪实验成为自然科学探究科学知识的黄金标准。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开始应用实验方法随机化分配干预（社会实验）以探索社会运行规律，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也于20世纪40年代开启了实验研究。自从实证主义兴盛以来，传统社会科学大多数利用定性或定量方法开展研究，但此类研究本质上属于观察研究而非实验研究，这为社会科学

* 孟天广，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领域识别因果关系带来方法论挑战（Rubin, 1980）。伴随着实验方法的发展及日益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准实验设计及因果推论工具的成熟，实验方法逐渐成为理解社会现象背后之因果关系的常见方法之一。

实验方法在公共治理领域独具方法魅力。首先，实验方法在应用场景上契合公共治理研究的多主体特征、制度竞争性和政策显著性。公共治理议题通常涉及政府、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且尤为关注通过优选或变革制度以破解治理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治理研究服务政策设计及实施，对人类社会的公私空间切实发挥重要影响。因此，公共管理学者们有必要借助实验方法准确地测量社会事实（Facts），准确地诊断“公共问题”并识别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探寻中微观层面的因果机制为制度或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指导，进而科学地评估政策效果以优选可行方案。其次，实验方法具备随机化配置干预、可重复性、标准化操作、可控条件、时序性等类似科学研究特征，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Druckman et al., 2011）。近年来，现场实验、调查实验和政策（自然）实验等非实验室实验方法逐步兴起，此类方法尤为适用于理解复杂社会系统的公共治理。受到全球范围内治理制度及实践的多样性这一重大事实的影响，非实验室实验呼应了公共治理领域对中观和微观层次理论创新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学术界把握宏观社会理论的中微观基础，从实践上推进适应性治理体系的演进（Olken et al., 2010；孟天广，2017）。再次，实验方法尤为契合公共治理研究的跨学科特质。将实验方法引入公共治理研究将有力地促成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社会与行为科学的深度融合，更有助于将生命科学、认知与神经科学等引入公共治理研究，激发公共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最后，改革以来的治理实践赋予开展公共治理实验研究的丰富机遇。众所周知，中国采取地方试验、政策试点、竞争性试验、协商民主实验、政策推广等模式推进治理转型，这为应用实验方法生产公共管理知识准备了丰富的“试验田”。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专栏的三篇文章均有力地呼应了当前的若干治理实验，分析了地方治理领域的偏好表达及合作形成。

徐彪的文章《监管竞争能促进合作吗？——来自经典公共品实验的证据》探究了监管执法失灵的成因及破解之道。作者利用行为实验方法引入三种给定监管情景来考察监管竞争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4轮博弈后监管垄断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减弱至与无监管情景没有显著差异，而监管竞争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且显著高于无监管、监管垄断情境。这源于在监管环节引入竞争，可以促进监管者的客观监管严厉性及被试对监管严厉性的主观预期。

李文彬等的文章《客观绩效、信任度与公众满意度——基于调查实验的探索》分析了信任度在客观政绩与公众感知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作者使用调查-实验法分析了客观空气质量如何影响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满意度。研究发现，良好的空气质量有助于提升公众满意度，而公众对空气质量数据的信任度强化了客观空气质量对满意度的影响，公众对提供空气质量数据的专业性或权威性的信任度越高，其影响就越大。这表明，政府增强空气质量数据的公信力是提高政策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柳建坤的文章《从严反腐与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的优化——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利用2011年和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重复性截面数据，构建了以2013年“全面从严治党”为外生干预的准自然实验考察腐败治理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结果显示，各省的反腐工作均提升了公众对政府的总体工作以及三项特定工作（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信息公开）的满意度，而加强反腐力度带来了更大的提升幅度。有趣的是，反腐更能够激励以低收入和拥有农业户口为特征的社会弱势群体对政府工作作出积极评价。

这三篇文章分别利用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自然实验设计来探讨公共治理中的偏好表达与合作形成议题，有效地呈现了实验设计及其方法功能的多样性。实验方法在公共治理研究中承担着多样化方法论功能，譬如阿尔文·罗斯（Alvin E. Roth）认为实验研究承担三类功能——寻找事实、理论对话、参与政策制定（政策评估），三种功能有效地将实验学者、理论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结合起来（Roth, 1995）。借助实验方法，我们既可以规避社会意愿偏差更有效地测量社会行为及偏好，更可以准确地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充分知识。当然，恰当地应用实验方法也需要了解其局限性。事实上，实验方法也存在诸多不足需要研究者设法应对。譬如，实验室实验尽管更好地实施了环境控制，但数据产生过程被批评缺乏现实性，而大量应用学生样本也被批评缺乏外部效度；调查-实验法通过代表性样本保障了外部有效性，但缺乏有效的实验控制；田野试验具有社会现实性但缺乏实验控制，也容易遭受学术伦理诟病（孟天广，2017）。因此，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者首先应该思考实验方法之于特别研究议题的适用性，然后谨慎地开展实验设计和伦理评价，遵循实验方法的标准化操作以保障结果的可复制性。

参考文献

- 孟天广(2017). 从因果效应到因果机制：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 探索, 5: 30-38.
- Sebastian Heilmann(2009). 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试验. 开放时

◆ 专栏：实验方法与公共治理之道

代, 7: 43 - 50.

吴敬琏(1994). 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 *经济学动态*, 9: 3 - 7.

Druckman, J. N., Green, D. P., Kuklinski, J. H. & Lupia, A. Eds. (2011).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rant, W. (2012).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 Philosophers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Olken, B. A., Acemoglu, D., Duflo, E., Finkelstein, A. & Nickerson, D. (2010). Direct Democrac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2): 243 - 67.

Roth, A. E. (1995). Introduction to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Kagel, J. H. & Roth, A. E. Eds. *Th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ubin, D. B. (1980). Randomization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ata: The Fisher Randomization Test Com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5(371): 591 - 593.